

# 專題研究

##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

智銘

### 一、玄奘大師簡傳

西人玄奘大師俗姓陳，單名禩，誕生地爲河南省之饒氏縣，即今河南省偃師縣，關於其出生年代共有四說；一爲隋開皇二十年（西六〇〇）、二爲開皇十六年（西五九六）、三爲開皇十九年（西五九九）、四爲仁壽二年（西六〇二）。祖父爲北齊國學博士，受時人崇拜。父名惠，學養亦深，尤以經術聞名，曾爲江陵縣令，爲時不久，隋朝乃亡，因倦於仕途，即此辭官歸隱田園，一生共生四子，二子陳素，少年時即在洛陽出家，即是長捷法師。奘師排行第四。自小親受庭訓，由於資質聰慧，喜讀聖賢之學，十歲時，父親去世，即隨長捷法師至洛陽，住淨土寺中。

當時之洛陽，不但是全國之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，且也是佛教最爲發達之地。各處寺院，常有高僧大德講經說法，長捷法師前往聽講時，常携奘師以俱往。因此種下善根，立弘法、利生之大志。

二十三歲時，隋煬帝派大理卿鄭善果至洛陽，主持度僧考試，當時限定錄取二十七名。可是參加應考者多達數百人，故所立錄取之標準至爲嚴格；不僅須學識基礎深厚、人品出衆、而且儀禮、家世、出身均須通達和清白。而最基本之條件爲年滿二十歲。使原想出家之奘師，大失所望，當他整日徘徊於大理卿行署門外時，終爲鄭善果所見。經詳細詢問其終日徘徊不去之理由後，特破格錄取，奘師乃正式出家爲沙彌。

奘師出家以後，由於煬帝之無道，驕奢淫佚，致使民怨沸騰而天下大亂，難民成隊，餓殍遍地。洛陽佛教寺院，亦在兵連禍結中，動盪不安。出家比丘無法修持辦道，紛向四川躲避，長捷法師偕同奘師亦逃奔長安，於莊嚴寺暫住。不久，長安亦陷入戰亂之中，兄弟二人乃續奔四川成都。四川因天時地利，未爲兵火所及，維持相當安定之局面，各地高僧大德陸續到來，成都乃成爲當時佛教之活動中心。奘師在長安時，曾親近法常、僧辯兩位論師，一位是攝大乘論之權威，一位則精通俱舍論，奘師向他們求法時，曾被讚許爲佛門之千里駒和再明之慧日，由此可見奘師天賦之高和學法之誠。至成都以後，由於碩德雲集，使他在無邊遼濶之法海中，迅速成就道業。但當時由於梵典東來不多，各大德所持，已無法滿足奘師追求真理之熱望。爲作更爲廣泛之探究，感成都已不是久居之地，不顧二兄長捷法師之留勸，冒三峽之險，順江而下湖北，經湖南、安徽、江蘇、河北最後又回到河南洛陽。在環遊中國一週後之奘師，道業已具有甚深基礎。但他並不因小有成就自滿，反立下宏願——往西求經，此時他已二十六歲。

貞觀元年，上表太宗，請求准許前往印度取經，太宗以天下甫定，爲防萬一，不許任何人離開國境。但奘師不喪初願，乃私行潛逃出境。橫渡白骨連綿之大戈壁沙漠，攀越天山南路，終於貞觀二年抵達北印度邊境。自此，即走遍五印大陸，參訪名師，蒐集梵文佛典。而在那爛陀寺，禮拜戒賢大師，學修佛道，爲其日後成就偉大道業之基礎。



奘師滯留印度前後十七年，於貞觀十八年乃負經返國，當足抵國門，上自當朝之太宗，下至百姓，無不予以熱烈之歡迎。奘師乃就長安宏福寺開始譯經，貞觀二十二年太子李治（唐高宗）為紀念其母文德皇后，建造慈恩寺，乃請奘大師（以下稱大師）移錫慈恩寺譯經，大師晚年，體力日衰，高宗勸大師又移錫玉華宮譯經。至麟德元年二月初五日夜半示寂，享年六十五歲，二十年間，共譯出梵文佛典凡七十四部，一千三百八十卷，成爲中國佛教史上空前絕後之偉大不朽巨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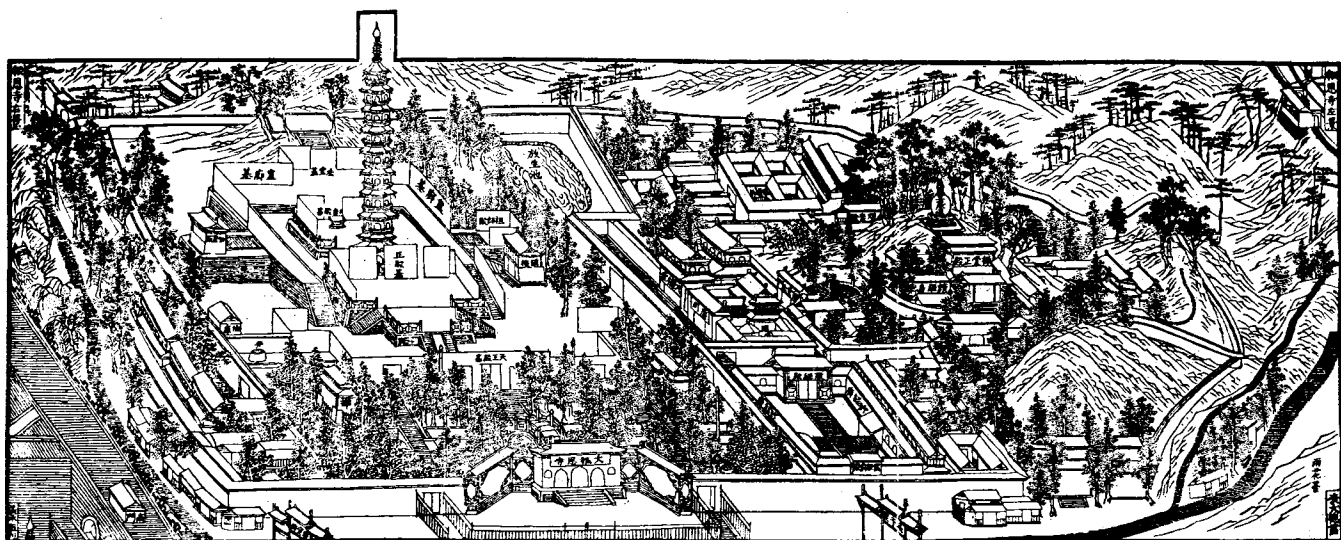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奘大師靈骨之變遷及發掘

奘大師示寂後，高宗命將大師遺體以隆重之佛教儀式荼毘，將舍利供奉在白鹿原（今潼水鎮東四十四里處），總章二年（西六六九）四月八日，高宗勸將大師舍利遷到樊川北原（今西安城南四十里處），修建塔宇供奉，同時，其兩大弟子窺基、圓測示寂後，亦建塔供奉於此。至肅宗時，賜塔額稱興教寺。其後，寺漸荒廢，至「塔無主，寺無僧」之狀態，大和二年（西八二九）安國寺義林於三藏忌日修葺之。凡此諸端，開成四年（西八三九）之塔銘及序，記述甚詳。唯此等塔宇，旋於僖宗廣明元年（西八八〇）時，黃巢攻陷長安，被其所毀，由僧將大師頂骨移奉於終南山以避亂。至宋太宗端拱元年（西九八八），金陵比丘可政，自終南山之紫閣寺迎奉大師頂骨南下，供奉於金陵天禧寺之東崗，此爲大師頂骨之所以在南京被發現之因緣。

根據史籍記載：吳之赤烏年間，康僧（西藏僧）奉佛舍利來金陵，吳大帝乃於是地建寺築塔，是爲該處有佛教寺院之嚆矢，亦江南有寺塔之始。其後，於晉之太康年間建長干寺。並築三層塔，梁武帝時曾加修葺。長干之名爲後人所沿用，並以之作其地之里名。唐代李白越女詞亦道及之。降至宋代改爲天禧寺，並建聖感塔，元代改爲慈恩旌忠教寺，後罹兵災而燬於火，明代重建則名之曰大報恩寺焉。大報恩寺起工於永樂十年（西一四一二），至宣德三年（西一四二八），費時十七年之久。在其側建琉璃

磚塔，稱天下第一塔，更設藏經殿，貯藏南藏經板，常住僧人五百，寺運隆盛。明代逐漸衰微，寺院規模亦隨之而小。至清代康熙五年，稍加修葺，但僅就琉璃塔爲中心之一角而已。咸豐六年，太平天國之亂，據南京爲首都，乃大肆破佛毀寺，大報恩寺及琉璃塔，難逃此難，僅留下一二遺蹟，供後人追懷憑弔而已。

清朝滅亡，民國成立，東鄰日本，侵華日急，民國二十六年之七月七日，於蘆溝橋尋釁，挑起中日戰爭，當時日本揚言「三個月滅亡中國」。後因蔣委員長號召全國總動員，長期作戰，拖住日軍，使其陷於泥淖。至民國三十一年，中日戰爭已逾五個年頭矣。當時駐在南京之日軍高森隆介部隊，於南京中華門外原大報恩寺原址，設立兵器廠。高森氏爲悼念在華戰死之日本士兵，欲於



兵器廠之後方丘台地建築稻荷神社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述地點平治土地，切除丘陵突出部之工程時，從切開約三十糎之斷面內，露出若干整齊之石材，計其場地，層於大報恩寺範圍內，惟不辨為何物，工程乃為之中斷，高森隆介氏乃邀請南京汪偽政府「文物保管委員會」之研究員（日籍）谷田閱次及幹事（華籍）顧天賜二人，前往實地調查研究結果，乃正式確定為大報恩寺原址無誤。惟當時所能見及之出土物，僅為二糎厚之土下露出三方石材，更下則有倒圓錐形之建築物，此乃從其周圍之土質上觀察而得者。倒圓錐之下端又有石材一層，向下方似有三米半之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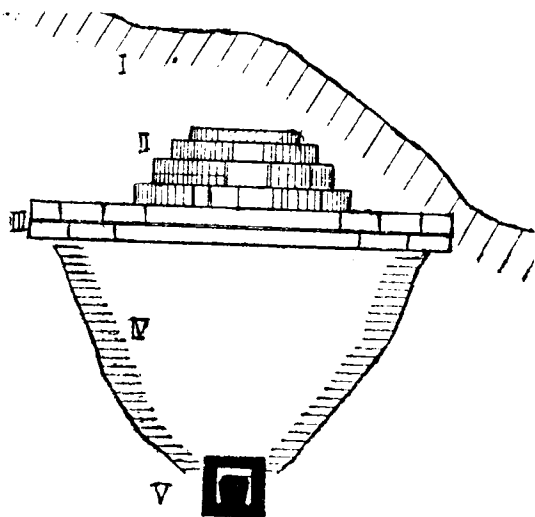
細察石材，即知其為建築物之基礎部，故其下層嵌有一層異質之泥土，為欲正確明瞭建築物之性質，決定將縱斷丘陵之工程停止，改變方針，先將覆於其上層之泥土小心削去，計劃將建築物之基礎首先全部呈露出來。

根據以上方針進行之結果，建築物之基礎部份，已可明確看清；形狀畧如下述：

一、以平方七米二十糎之長方形之石材疊築而成，中間部則有圓形四階梯之壇，壇用扇面形石材構築而成。

二、圓形壇下端之直徑為三米六十糎，最上端之直徑為一米八十糎，每隔一段約減六十糎，漸次遞減，壇之全體約高一米二十糎。

三、壇之完全形狀，因部份尚未掘出，不能確定，故上述數字，有若干為初步之推定。又方形之石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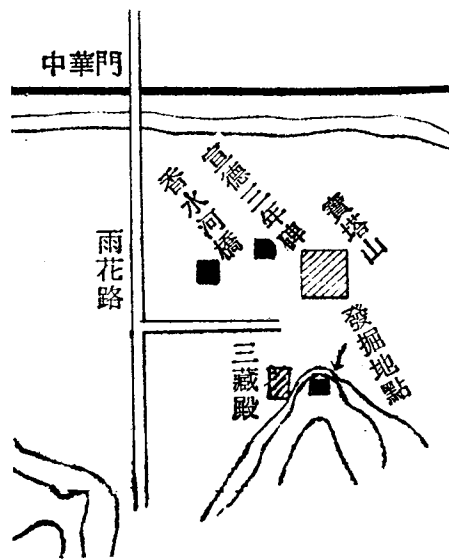
厚自二十五糎至三十糎不等，此乃因地形關係，蓋第二層階梯部份與第三階梯部份有所不同。

四、於發掘上述基礎時，在壇之週圍泥土中發現甚多磚塊，

其中有弧形邊緣，而削薄之扇面形磚，亦有附以唐草凸花之長方形磚及花瓣形之大磚，構成龜形之特種磚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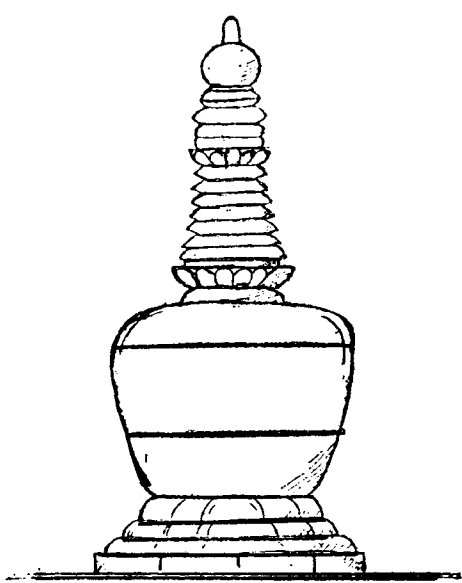
由上述初步挖掘所見，建築物平面之大及其磚片之多，可斷定其為相當大規模之遺蹟，至此更可推知其為一磚塔。於是翻閱有關大報恩寺諸文獻，明代葛寅亮所撰「金陵梵剎志」存有大報恩寺建築平面圖，乃按圖索蹟，並徵之石橋及石碑之位置，認定該發掘物可能為三藏塔之塔基，依此認定為根據，而定寶塔山之位置。寶塔山應在石橋之東，即發掘地之北之一丘陵地。寶塔山者，大報恩寺寶塔即琉璃塔之所在地也。而與發掘地點，在相互之關係上，與「金陵梵剎志」所述完全相合，以此為依據，則琉璃塔之位置與三藏塔之位置，可以同時確定矣。

關於三藏塔在金陵有關古蹟之書本記載，僅稱之為「三藏塔」在其上未加其他名號，考稽史籍：「景定建康志」四十六卷上，明白載有：「端拱元年（宋太宗年號——西九八八），僧可政往終南山（紫閣寺），得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師頂骨，為建塔歸瘞於寺（指天禧寺前身之長干寺）」，其後，葛寅亮之「金陵梵剎志」三十一卷載有：「禪堂後有唐玄奘石塔，即藏爪髮處……」，陳開虞之「康熙江寧府志」三十一卷載有：「左為禪堂，有三藏殿，唐三藏法師石塔在焉……」。姚鼐之「嘉慶江寧府志」二卷載有：「……又有唐三藏法師石塔，後有放生池，康熙二十三



年（西一六八四），聖祖南巡幸寺……。「清人凌大德所繪「大報恩寺全圖」（附「金陵梵剎志」內）於報恩寺之東院，禪堂正殿後面土山上，繪有一座小塔，註明「三藏塔」字樣，可知三藏塔自宋朝至清代，向爲金陵名蹟之一，並無人異疑。其中僅明代南京人顧起元著「客座贅語」一書，其中曾謂：「余嘗至大報恩寺，登三藏殿，後階有塔，云是唐玄奘葬處，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寺，以何因緣，復過江表？乃考晉隆安中（晉安帝年號西三九七—四〇一），延至鳩摩羅什，施寺，賜額法王，尊爲三藏國師，寺名白塔，後併入報恩寺，疑此是三藏舊塔院，誤認爲唐之玄奘耳。」顧氏之有此疑，蓋其僅知玄奘大師示寂於長安，平生未會到過金陵，因連想在金陵者僅有晉代高僧鳩摩羅什，而致兩事誤合爲一，甚至張冠李戴，發生絕大錯誤。但顧氏旋即發現自身錯誤，在同書之本條下云：「頃檢金陵新志云：白塔寺在東，即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師頂首之所。金陵僧可政，宋端拱元年，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，俗名白塔，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，惜所謂塔記，無從可考。」至此，唯一之疑竇亦不復存在。

經過如此綿密考證史冊之結果，乃確認此發掘物即爲唐三藏玄奘大師頂骨之所在，即行加速挖掘，直至全部建築物呈現以後，發現三藏塔之建築樣式，並非習見之多角形寶塔，而爲塔婆（圓）形式者，在方形基礎之上，有石造圓形之基壇，其上則有四



分之三近似球形之磚築塔，依據磚之形狀，則塔上盤以蓮花瓣，上部則用同樣之磚築成相輪。

此種樣式之塔，在南京附近麒麟鋪東北有遺存明代弘治年間建造之行覺禪師塔，此其代

表式樣耳。三藏塔殆亦爲此種形式。而規模較爲宏大而已。由此基壇之發掘，而認定三藏塔之位置，藉建材而推定三藏塔之樣式，初步之收穫甚宏。

繼續發掘嵌入塔下倒圓錐形部份之異質土層，其下即恰當基壇之中心部，直下約三米半許，發現一石槨，石槨之內圍爲五九乘七八糲之長方形平面，深約五七糲。在其內，更藏有五一糲平方，石函用磚作蓋，體之兩側刻有文字，其一面之刻文如左：

「大唐三藏大徧覺法師玄奘頂骨，早因黃巢發塔，今長干演化大師可政，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，天聖丁卯二月五日，同緣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、弟子丁洪審、弟子劉文進、弟子張靄。」

安唐三藏法師之舍利塔毀於黃巢之亂，其頂骨由長干寺演化大師可政由長安傳得，携奉而至金陵埋葬者。天聖丁卯即天聖五年（西一〇二七）時，演化大師可政，據明代顧起元著「客座贅語」卷二中，謂曾担任更名「天禧寺」後之住持。

以上刻文與「景德建康志」及「金陵新志」互相參證，可政於長安得玄奘大師頂骨而葬於是寺，完全一致。惟以上二志謂頂骨得自端拱元年之時，而石函刻文則作天聖五年，其間相距三十九之多，傳骨與埋骨之所以相距三十九年之久者，可以想見，是

大唐三藏大徧覺  
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  
發塔今長干演化大師可政  
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  
天聖丁卯二月五日同緣弟  
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  
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  
弟子張靄

可政大師先將頂骨供奉於別處，至天聖五年，方始安葬之也。至於刻文所示天聖五年二月五日之埋骨時日，決非出於偶然，當係刻意按照麟德元年玄奘三藏大師入寂之月日而爲之者，具有紀念性質。

其次，在上述刻文之反對面石函上，尙有左列刻文：

「玄奘法師頂骨

塔，初在天禧

寺之東崗，大

明洪武十九年

受菩薩戒弟子

黃福燈□□□

□□，普寶遷

於寺之南崗三

塔之上，是歲

丙寅冬十月傳

教比丘守仁謹

誌。」

後述刻文字體

，較前者爲劣，依

據上二刻文，可以確知天聖五年埋骨之塔，在天禧寺之東崗，此次之發掘地則在南崗，蓋係明洪武十九年所遷葬者。由以上二刻文之發現，關於玄奘三藏塔之考證，已爲事實所證明，再無懷疑之必要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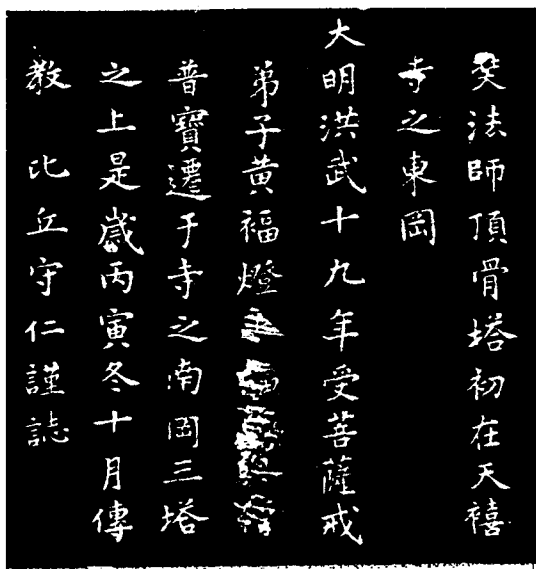
掀開石函，發現內藏遺物如下：

甲、頭骨之一部：

藏於薄銅板匣（方一六·五，高五·五糲）內，連帶耳部之頭骨一部份，所謂薄銅板匣者，至發掘時止，已相當腐蝕，可以推想爲匣蓋之部，僅係數枚破片，故稱之爲匣，乃屬推想者也。破片之上，有堂皇之字，可以判明爲「唐」「三藏」「師」等字。

乙、鎔鑄小箱（一六·一×九糲，高一〇·五糲）。

丙、銀質小箱置於「乙」項之鎔鑄小箱內，大一二·五×七



（面一另之函石在）字文刻石年九十武洪代明

·三糲，高六糲，有蓋。蓋上有雲龍紋，一部曾鍍金，蓋之四邊及箱之週圍，飾以唐草花紋，箱底刻「大唐三藏」四大字，其傍有「壬申四月吉日」文字，蓋之外側刻有「大元至順三年壬申四月吉日，天禧住持弘教大師演吉祥置」之銘文——其中住持「演」者，在「金陵新志」有「廣演」其人也，銀質小箱之中，藏有金質之僧形細工像（高三·五糲）一尊，及小玉器、念珠、以及各種小珠凡三十五件。

丁、璧玉一件（徑八糲）。

於石槨之內、石函之外，尙藏有左列物品：

戊、銅器：盃（徑一四·五，高五·五糲）一個、鼎（徑六

·五，高六·八糲）一件。燭台（高二二糲）。

己、瓷器：青瓷瓶（體徑一〇·五高一九糲）二個，青瓷香

爐（徑一四高九·五糲）一個，青磁洗（徑一三高三·五糲）一個。

庚、錢：連破片在內共有三百數有多枚，種類計有唐、宋、元、明各代，自唐之開元以至明之洪武，雜然並陳。

辛、供養麥粒一包。

由以上之出土物看，有三點須加認明：

一、僧可政於宋之端拱元年，自長安將玄奘大師頂骨傳奉南

來，至天聖五年，始下葬於天禧寺境內。

二、到元朝至順三年時，天禧寺住持僧廣演，未知以何種理

由，將頂骨掘出，另以銀質小箱爲裏，外套鎔鑄小箱，而供養之

。前文所述金質細工僧像，或係玄奘三藏像，其他諸物如小玉器

等爲附加物，以兩層箱嚴加保藏。可以想見，此次之舍利供養甚

爲隆重，此可由出土物推測之。

三、降至明初，又不知因何理由，將舍利由寺之東崗而遷葬

於南崗，即此次發掘地點，埋藏物中之銅器、瓷器及錢幣等，諒

爲此次附加，瓷器中之各物年代不同，石槨則全爲明初物，塔之

基壇自亦建於是時，故此塔乃發掘前之定點，未曾再被遷葬。

（未完待續）